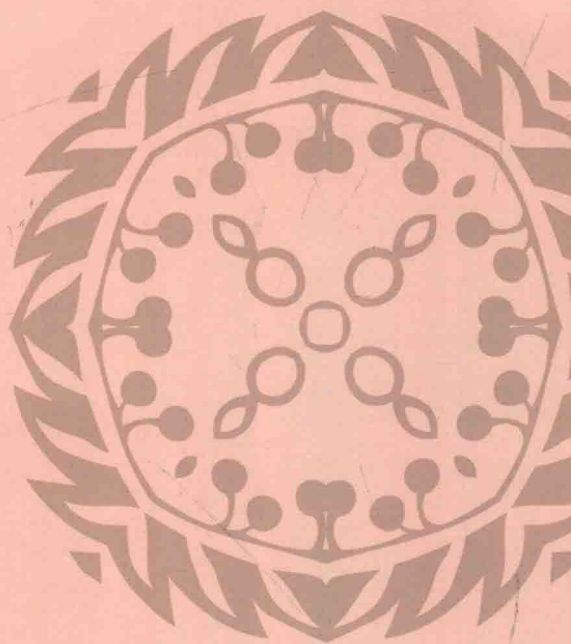


# 译事三论

冯 曼◎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本研究成果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助

# 译事三论

冯 曼◎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译事三论 / 冯曼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  
有限公司, 2014.12

ISBN 978-7-5100-7883-5

I . ①译… II . ①冯… III . ①翻译—研究 IV . ①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1315 号

## 译事三论

---

责任编辑 宋 焱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7883-5/H · 0893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目 录

## 第一篇 文化翻译论 001

第一章 语言、信息与翻译 004

第二章 基于语言功能动态分布的文化翻译策略 016

第三章 翻译社会学视角下文化外译研究体系的建构 027

第四章 文化翻译中的译者身份——以丁韪良为例 040

## 第二篇 翻译伦理论 057

第五章 翻译伦理学的发展与学科定位 059

第六章 翻译伦理的多维性 066

第七章 作为翻译职业伦理核心的职业道德规范建设 081

第八章 翻译技术的伦理问题及其制度解决途径 100

## 第三篇 翻译教育论 117

第九章 打造 MTI 教育竞争优势的战略规划 122

第十章 创建个性化 MTI 教育模式的实施策略 133

|      |                                    |     |
|------|------------------------------------|-----|
| 第十一章 | 基于职业化导向的 MTI 实践教学体系                | 142 |
| 第十二章 | MTI 个性化核心课程建设：自选翻译行业探究             | 152 |
| 第十三章 | 个性化 MTI 教学方法个案研究：<br>基于知识本体的专题口译教学 | 159 |
| 后 记  |                                    | 177 |

## 第一篇 文化翻译论

文化翻译研究包括本体研究和外部研究。本体研究关注的是翻译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如文化负载语句、文化审美、文化思维等）的处理；外部研究考察的是翻译活动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含翻译活动对文化的影响，也考察文化历史背景中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整个过程<sup>[1]</sup>以及对翻译系统<sup>[2]</sup>的影响。

文化翻译的外部研究的研究领域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学兴起时就不断从各个视角得到拓展。1990 年，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对这种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的范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sup>[3]</sup>。之后，多部文化与翻译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相继出版。图里（Gideon Toury）的描述研究，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和赫曼斯（Theo Hermans）的操纵派理论，莱斯（Katharina Reiss）、费米尔（Hans Vermeer）、诺德（Christiane Nord）等人的功能派理论，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以西蒙（Sherry Simon）为代表的女权主义学派和以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等等，都可以归入翻译研

[1] 包括翻译发起、翻译选材、翻译决策、翻译传播、翻译接受等。

[2] 翻译活动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围绕着翻译活动的开展存在着翻译主体、翻译客体，翻译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环境，制约和促成翻译发生、传播的内在机制以及翻译决策等内在规律。这些与翻译活动相联系的主、客观因素，因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就形成了翻译系统，成为社会系统诸多子系统中的一个。

[3] 苏珊·巴斯奈特所写论文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收录于其与 Lefevere André 于 1990 年合编的论文集: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本文参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在中国引进的版本。)

究文化学派的大框架之下。

文化翻译的外部研究在经历了热发展之后也迎来了冷思考,不断受到诸如“脱离本体研究”、“无限扩大了翻译研究对象的外延”、“学术边界模糊”、“不能为翻译建立标准”等之类的诟病。然而,文化翻译的本体研究和外部研究虽各有侧重,却不能割裂开来。很多外部研究非常重视采用本体研究的方法,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如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理论、篇章语言学语用学等),从译文的“改写”<sup>[1]</sup>中去发现翻译决策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影响等等。如果离开本体研究,脱离以话语为基础的比较分析,文化翻译的外部研究也缺乏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本体研究也应借鉴外部研究的成果,在处理翻译的文化因素时,从各种描述性的研究中了解“文化翻译存在哪些特殊处理”,“为什么这么处理”,为最后完成“怎么译”提供更为全面科学的指导。这正如谢天振(2008)在分析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时所说:

如果翻译的本体是指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本身,那么翻译研究的本体除了语言文字转换过程的本身之外,它必然包括翻译过程以及译者、接受者等翻译主体和翻译受体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以及对两种语言文字转换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文本之外的因素。

文化翻译的本体研究长久地徘徊在文化翻译策略是归化还是异化、译语文化取向还是源语文化取向、接近读者还是接近原作者等二元对立的讨论上。如果不从翻译本质上进行认识,这些问题恐怕很难决断,最后只能得到归化、异化并非对立排斥,而是辩证统一的结论,其适用标准仍然含糊,文化翻译策略仍然得不到好的解决。只有从翻译本质的分析出发,了解文化翻译策略应该解决哪些问题,才能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关注文化翻译本体研究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翻译的外部研究。针对目前文化翻译研究中“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刚刚

---

[1] 这里的“改写”并非是“一切翻译都是改写”之意,而是译文与原文对照存在有意的删减、增加、改动等不对等的处理。

起步，视野多局限在本学科的传统领域，对文化外译的研究以微观研究、个案研究、本体研究居多。由于“文化走出去”是一项国家助推的文化工程，其运作涉及整个文化外译子系统，<sup>[1]</sup>外译研究的本体一样也离不开制约外译活动的语言之外的因素，因此，从翻译社会学视角审视文化外译研究体系能提供更为整体性的思路。

最后，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身份定位与角色选择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话题。不但译者的多重身份与作为核心的译者身份之间的兼容与对立深受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且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对自己动态身份的认识与角色的动态选择也会影响其对文化问题的处理策略。

---

[1] 如果将翻译分为引进翻译和对外翻译，翻译系统则可以视作由引进翻译子系统和对外翻译子系统构成。



## 第一章 语言、信息与翻译

文化翻译观离不开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而讨论翻译的本质也不能脱离对语言的探讨。翻译理论的发展可以说一直受各种语言哲学观的影响。语言哲学探讨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想、语言与真理的关系，这些问题与以语言为媒介的翻译活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语言哲学对语言意义的探讨——无论是指称论、观念论、行为论还是指号论——实际是从不同角度渐进地揭开语言的多重属性：语言描述的客观实在性、语言使用的意向性、语言本质的社会性、语言发展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这些语言哲学观对我们认识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方法、原则、标准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一、翻译定义中体现的翻译观

我们普遍谈到的翻译，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活动，它所连接的两端——源语与译入语都涉及语言本身。那么，在这个跨语言活动过程中翻译到底在译什么？

综观国内外众多对翻译的定义及其本质的阐述，我们可以区分以下几类翻译观：

第一种观点认为翻译译的是语言本身，即翻译是语言间的符号转换，译者关注的是译语与源语形式之间的对应。翻译“属于人类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刘宓庆，1990），是“把一种语言（源语）的话语材料替换成另一种语言（目的语）中对等的话语材料”（卡特福德，1964）。

第二种观点认为翻译译的是人的思维活动的内容或结果,即思想。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张培基,1980)。“翻译是译者的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思维活动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应包括思维活动的结果(译文作品),而且应包括这个结果的社会效益(译文读者的反应)”(杨自俭,2008)。

第三种观点认为翻译译的是语言承载的意义。“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的过程”(巴尔胡达罗夫,1985)。

第四种观点认为翻译译的是文化。语言是特定文化下的符号系统,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当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进行交流时,<sup>[1]</sup>实际发生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流时语言和语言之间并不直接相通,必须借助翻译。所以说,翻译的任务在本质上就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所进行的交际”(范东生,2000)。

最后一种观点把翻译定义为信息转换,“将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外一种语言传达出来”(蔡毅,1995);“翻译的本质是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吕俊,2001)。奈达(Eugene Nida)在其早期的研究中也强调从语义上、文体上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在译语中再现源语的信息。(谭载喜,1988)

上述几种翻译观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其实都没有离开语言哲学所探寻的两个重要议题:①语言和世界的关系;②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陈嘉映,2003)后文将结合对语言的认识来探究翻译的本质。

## 二、语言哲学与翻译观

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系统,其研究重点是对语言进行内部结构的分析。受其影响的翻译观注重语言形式的转换、语义和句法分析。解构主义哲学家颠覆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否定语言的终极意义,否定

[1] 这里指的是持有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流时。

文本的封闭性,使得翻译打破了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主从关系,更多关注语言的外部因素,催生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建立起了更加多元的翻译理论。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语言的普遍性、客观性决定语言的可译性,语言的特殊性、主观性又决定了语言的不可译性。(朱湘军,2012)洪堡特主张的语言与精神的同一性,以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出语言是人类精神家园的观点使得翻译关注思维活动、思想内容的转换。格莱斯(Grice)、塞尔(John R. Searle)、胡塞尔(Edmund Husserl)、奎因(Quine)这些语言哲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将语言的意向性、社会性揭示出来,将语言意义引入了语用交际层面,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功能派翻译理论的萌生和发展以及语用翻译研究。

语言哲学的发展推动了翻译理论的研究,语言哲学对翻译学科的引领作用还将随着自身的发展继续下去。

翻译既然是一种语际间的转换活动(无论其转换的是什么),那么对翻译本质的认识都离不开对语言本质的探讨。

### (一) 语言是什么

语言到底是什么?是符号系统?是文化载体?还是思维工具?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回归语言本质,回到世界的本原状态。哲学界普遍认同构成宇宙的三大基本元素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由于物质的存在,物质之间的普遍联系就表现为信息和能量。其中能量是物质在运动中的量化转换,而信息则是物质相互联系的状态和方式。物质之间借助能量的转化相互联系,并表现为信息的传递。物质的多样性决定了物质间信息传播载体的多样性,可以是气味、声音、颜色、运动方式,甚至是分子排列组合结构以及其他更多人类已知或未知的载体形式。

人与世界的联系也表现为信息。不同物质传播信息的载体和信道不同,能够为人类识别的信息只是其中一部分。相比于世界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人对自己主动与世界的联系更为自信,因为人类创造了一种联系世界、联系人类社会的重要工具,这就是语言。

从其产生和发展来看,语言是人类在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历史长河中创

造并发展而来的信息载体，或者说是编码工具。相对于人类早期用于传递信息的手段（如原始岩画、结绳记事等手段），语言系统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因其信息承载量大，及其信息传递的相对确定性，而得以留存下来，并不断地发展进化。语言分层次的组合系统构筑了无限多的表达形式，以应对无穷的信息编码需求。在人类以语言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涉及信息编码的问题，编码规则在语言中表现为词、句、段、篇等的组织规则，如词法、句法、语用规则和篇章规则等。语言是由语言单位和语言规则组成的有机系统，就像高等生物的器官系统，由多个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 （二）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早期的“图像”论中，语言与世界是对应的，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语言是命题的总和。因为存在可能世界命题的总和大于事实的总和，真命题的总和才是世界的图像。（陈嘉映，2003）维特根斯坦以“图像”喻指意义的生成方式，意义就是图像对世界的摹画，它是由图像显示出的“映射关系”。“图像论”意义观的内核就是以语言工具论为基础的意义指称论，（谢萌，2012）这种思想忽视了语言的本体论价值。其实，语言自被创造出来之后，就在人与世界的不断联系中根据信息传递的需要不断演变与进化，形成了自己的生命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反作用于人和世界。因此，洪堡特（2001）相信“语言乃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1992）也认为，话语“不仅仅反映和呈现社会事物和关系，其本身就构建和构成它们”。

语言本体论者自海德格尔、洪堡特以来就认为语言和世界是同构的。然而，他们又忽略了语言的工具性，忽略了语言不是由实体组成，而是由符号、概念组成的整体。语言表达世界是间接的。在多层次组合的系统运作下，语言虽然具备无限的表达潜力，但是由于语言的抽象性、不确定性和信息本身的千变万化，无限的语言形式与无限的信息之间并不能保证一一对应。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却并不保证与信息的完全契合，就如同一幅图画，图画与其所表现的现实可以无限接近，却永远也不能完全等同，

更何况人与世界的联系既包含了实体物质世界又包含了人类自己的心智精神世界。无论对现实世界和心智世界，人类的认知既不充分也不固定。

那么语言作为人与世界联系的纽带，如何表达相对确定的信息以体现其稳定性呢？这主要受两个因素制约：①语言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其传承和演变受到了使用者和使用者所处世界的制约，因此打上了社会的烙印。洪堡特说：“民族的语言就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民族的语言。”

（黄振定，2007）这说明语言属于民族，不属于个人，个人使用的语言是民族的语言。语言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义以及规则是语言承载信息具有确定性的基础。②语言作为思维工具具有普适性。大部分人通过思维的方式与世界发生联系，其中思维又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语言反映出的思维活动是有着共通性的，有规律可循。

语言的普遍性、客观性、历史性、社会性、思维普适性等特征可以形成合力，对其承载的信息产生向心力，使得信息内容和传递效果通过这些语言特性聚集，形成相对确定的中心。但是由于个人对语言编码系统的掌握情况不同，语言系统的局限性和信息本身的多样性、特殊性等因素又使得语言系统和信息之间始终存在离心力，使得语言编码偏离信息，产生信息损失和扭曲的可能，语言系统和信息之间存在的离心力和向心力相互制约最终决定了信息呈现的效果。

### （三）语言如何传递信息：信息的维度和语言功能

人的语言活动实际上是人与世界以语言为载体的一种联系方式，是一种信息传递活动。信息的传递带来能量的转换必然对世界产生影响，产生作用力，因此信息本身也具有物质性。比如，在“望梅止渴”的故事中，人的感官（听觉）接收到梅子的信息，会激活人吃酸梅的经验，从而刺激腺体分泌出唾液。这是信息物质性的有力佐证。语言作为信息的载体，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也会产生作用力，作用于人与世界，体现为语言的功能。

语言传递的信息是立体的，这主要取决于人与世界联系的多维性。维索尔伦（Verschuern, 1999）在谈到语言的选择与交际语境的顺应时，对语用世界（语境）进行了三分：物质世界、心智世界、社交世界。但是他的

划分主要是为了说明语言使用的交际语境。此外，社交世界实际上介于物质世界和心智世界之间，其划分也尚有模糊地带。如果采用哲学常用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划分法，可以将世界进行如下划分来思考人与所处世界的关系（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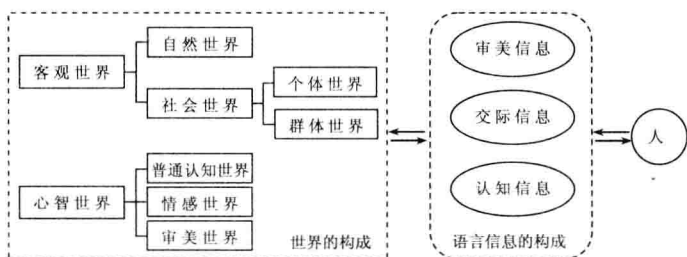


图 1-1 人与世界的联系（通过语言信息）

我们所处的世界由客观世界和心智世界构成。客观世界由人自身之外的自然物质世界以及由个体和群体组成的社会世界组成；心智世界则包括普通认知世界、情感世界与艺术审美世界。

人与客观世界以及自己的心智世界发生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对客观世界和心智世界的发现——普通认知与表征；人与其他社会个人、群体之间的关系——社会规约和交际；人对完美世界的追求——怡情审美。因此人在与自然界、自身心智、人类社会（其他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中存在三大类信息：普通认知信息、社会规约交际信息、怡情审美信息，它们构成了语言信息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代表着语言的三大功能：普通认知功能（思维、想象、启发、记忆功能等）、社会规约和交际功能（政治、宗教、规范、工具、表达、司事、调解、交往功能等）、审美艺术功能（娱乐、修辞功能等）。

语言信息的三个维度随着人与世界发生联系的目的和方式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层次，也使得语言为传递这三类信息而调用不同的编码规则。传递认知信息涉及的编码规则较多，主要涉及语义规则、句法规则、语体规则、语用规则等；语用规则、语体规则更多地服务交际信息；修辞规则更多服务于审美信息。语言传递的三类信息不同层次地交织在一起，使得话语实现的语言功能也呈现出不同层次，并动态共存。因交际意图的不同、

交际环境的限制,各项功能会动态地凸显出不同的地位。也就是说,信息产生的动力(不同的交际意图)、信息内容、信息所发生的场所(不同的交际环境)以及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都会造成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在各项功能上的动态分布。语言信息的传递实际上是借助语言规则,不同程度地操控各个维度上语言功能的实现,实现多维度立体信息的传送与接收。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听到一句话时,很快就能对其中的内容(认知信息)、隐含的交际目的(社会规约交际信息)以及是否能够怡情审美(审美信息)做出判断的原因。

#### (四) 翻译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

翻译首先是一种语言活动。语言活动不能脱离主体因素,具有明显的意向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将语言与生活形式结合起来,奥斯汀(Austin, 1962)则认为语言表义的目的是为了行事,意义包含并取决于人的目的(意向),以言行事就是通过语言的意义来实现人的意义。塞尔的心灵哲学研究阐述了心灵与世界的因果联系,意向性是心灵借以内在表现世界上的物体和事物的特征。(塞尔著、李步楼译,2006)这些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语言使用的意向性。

翻译作为跨语言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活动,也具有意向性,是一种有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翻译所译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源发于意向的、以语言为载体的信息,即语言表述的三种信息的混合体(立体信息)。如前所述,语言表述的信息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仍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否则信息将无法传递和解码。

人类信息传播有着目的性。根据信息传播理论,译者接收信息后再次传播给受众必然会受到信息二次传播目的的约束。由于有了人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意向性和目的性,就有了译者作为信道对信息的选择和整合,继而就有了因跨语言信息传播目的(翻译目的)不同而存在对不同维度信息进行的选择性传播。既然“原文一开始就不是充分、完整、彻底和单一的”(Derrida, 1985),那么翻译是否一定要忠实原文呢?这就要看翻译目的是否要求信息在各个维度上保真。尽量保真的翻译是理想中的完美翻译,在大多数交际情景下都有着其交际和伦理价值。然而,由于不同的语言编

码系统并不能与信息完全对应,往往导致信息的编码和解码不统一。编码规则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不同,可能使信息的接收和处理出现自觉或不自觉的强化、弱化、轻化、压缩、增益。因此,译者根据翻译目的自觉地对信息进行的改译、写译、拟译、编译、节译、选译、摘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翻译变体。相对尽量保真信息的完美翻译而言,翻译变体的存在更普遍。为理解翻译这一信息传播活动,我们可参考图 1-2 所示的翻译的信息传播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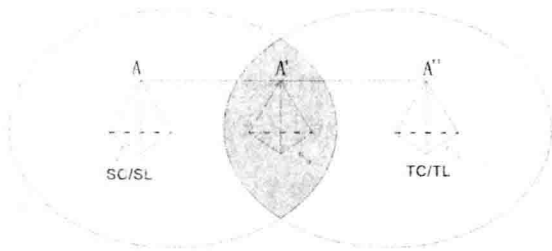


图 1-2 翻译的信息传播模式

(说明:符号含义:A:源语信息;A':译者所接收到的信息;A'':译语信息;  
SC:源语文化;SL:源语;TC:译语文化;TL:译语语言。)

该传播模式的含义可解释如下:

(1)  $A \neq A' \neq A''$ : 源语信息与译者接收的信息,以及译者用译语传递的信息不可能完全等同。

(2) 当翻译信息传递的目的要求信息精准时(如:谈判重要时刻,客户要求译员对方每一个字都要尽量传递的情况), $A \approx A' \approx A''$ 。

(3)  $SL \rightarrow A$ : 信息发送者根据信息传递目的决定信息内容,通过选择 SL 的意义,并预期实现不同层次的语言功能进行编码,构筑了实际的立体信息 A。

(4)  $A \rightarrow A'$ : 译者掌握着两套编码系统,利用源语编码系统对信息 A 进行解码时,必然会不自觉地受到译语编码系统的影响,获得立体信息 A'。如果信息传递的目的要求信息精准,译者应尽量靠近原作,使用源语编码系统尽量避免译语编码系统的影响。

(5)  $A' \rightarrow A''$ : 译者根据第二次信息传递目的(翻译目的)对信息 A' 进行选择加工处理,利用译语编码系统对不同维度的信息进行有侧重的传



播,构筑了立体信息A”。这个过程中源语的编码系统也可能参与译语产出。虽然信息接收阶段,译者对信息可能产生选择性过滤,或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产生解读偏离,但是其解读仍然是尽量还原源语信息。翻译的社会性、意向性主要集中体现在信息的二次传递阶段,改写决策就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

(6)在跨语言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的编码和解码都要受到信息本身、语言编码系统特点、信息传播者自身的语言编码能力以及信息传播的环境和目的等因素的制约。

### 三、翻译与动态语言功能实现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活动,翻译对三种信息的传递主要通过实现相应的语言功能来完成。

普通认知信息传递:借助两种语言编码系统,译者对字、词、句、篇章的选择应不给目的语读者造成认知困难,两种编码承载的认知信息量应该是相当的,除非翻译目的另有要求。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却普遍存在信息泛滥、信息污染,为提升认知信息传播的效率和质量,大量对信息不同程度的加工处理应运而生,从而也催生了传统翻译意义上的各种变体:变译。

社会规约交际信息传递:人的交际活动必然遵守其所在文化的社会规约。一方面,社会规约对语言编码产生影响,为保证信息接收方的有效输入,交际信息的翻译应该采用目的语文化规约对源语信息进行二次编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申请奥运会,申奥的文件就必须按奥委会的标准和隐含约定进行撰写,否则很难达到交际目的。“How do you do?”产生于英国工业革命前,家庭手工作坊普及,家家户户见面打招呼时都互相询问生产情况,因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句,而是承载了相互寒暄的功能。而汉语中的寒暄语“你吃饭了没?”,“你去哪呀?”可能会造成译语读者对源语文化认知上的误解,因此在目的语转换中我们为区别本土招呼语,将之翻译为“你好!”或“近来可好?”。

另一方面,由于交际主体权力的不平等,权力话语者如社会组织对人